

中文视窗

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描绘丰富的世界。

2014年11月19日

总第8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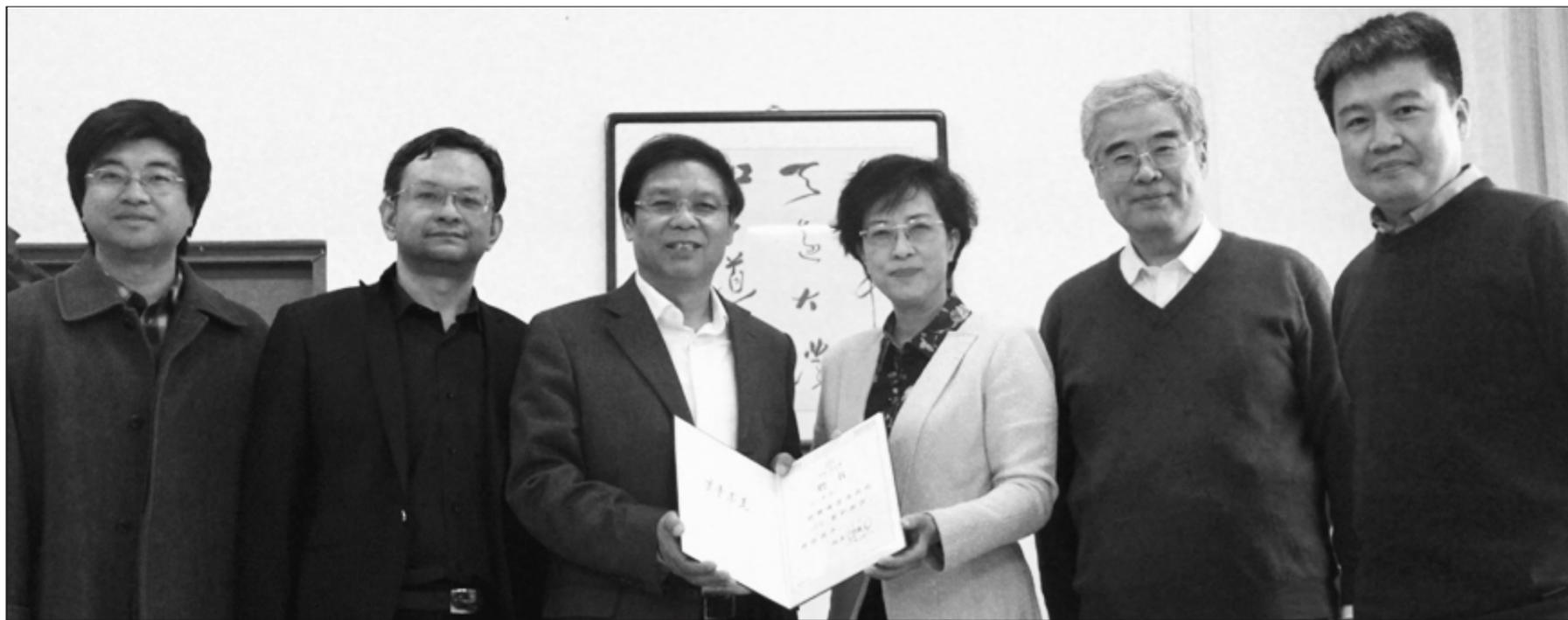
■ 主 管：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 主 编：朱 敏

■ 题 词：杨慧林教授

■ 指导老师：胡玲莉 黄彦菲

■ 副主编：刘启民 李 黎 王亦琳 李芙蓉 袁梦洁 周 晓



张江教授加入文学院

11月19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在人文楼二层会议室作了主题为“强制阐释——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反思性认识”的演讲。讲座前，学校党委副书记会见了张江教授，并在受聘仪式上为张江教授颁发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聘书。

我校国剧研究中心教师应邀出席梅兰芳表演体系国际学术研讨会

为纪念中国戏曲大师梅兰芳先生诞辰120周年，由中国艺术学院发起举办的梅兰芳表演体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0月22日-23日在京召开，来自中、韩、日、法、俄等国家的近60位戏曲界专家学者就梅兰芳的表演体系进行了深入讨论。我校国剧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孙萍教授、张一帆老师、江棘老师应邀出席本次会议，并在会上进行专题发言。

会上，孙萍老师结合其长期海外文化交流与公共外交的具体实践，首次将1930年梅兰芳访美这一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文化事件纳入公共外交视野。张一帆老师着眼于梅兰芳1949年在天津就京剧改革问题所提出的“‘移步’而不‘换形’”之说，对这一说法展开了详实有力的“名实之辩”。江棘老师则重点探讨了日本剧坛巨擘坪内逍遥对于梅兰芳1919年访日公演的评论及其写作背景，将坪内逍遥这一缺席者重新带回梅兰芳访日公演的舆论研究视野之中。

我院影像论坛第八期重庆大学张华博士重述30年代影评推手姚苏凤

10月24日下午，重庆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华博士做客文学院影像论坛，为大家带来了主题为“姚苏凤——1930年代中国影评活动推手”的讲座。苏涛老师主持了讲座，陈涛老师以及电影相关专业的同学们参加了讲座。

张华博士以大量的史料为基础，通过分析姚苏凤在1930年代的影评活动，对他作为《每日电影》主编的身份，作为“中间派”报人以及作为当时主要影评活动推手的作用进行了更细致、更公正的考察。作为影评活动的推手，姚苏凤不仅将不同观众，不同的文艺派别联结还将理论派和实践派联系在一起，在拍《青春线》之后，意识到编导对观众了解的必要，证明了写理论文章同观众需求的指向并不吻合。

张华博士在讲座最后提到了对史料细微之处敏感把握的能力问题，这种能力是一种“悟性”，要建立在扎实的材料搜集和分析能力的基础之上，要带着问题去看史料，对这些常见的细节的深入解读，也许会发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我院研究生会职业发展部举办研究生就业去向发布会

10月26日，由文学院研究生会职业发展部主办的就业去向发布会在人文楼会议室200举办，活动由2014级研究生李博洋和袁雪飞主持，旨在让大家尽快了解和掌握最新就业形势，提前规划，为未

来求职奠定基础。

晚上6:30，活动正式开始。李博洋首先按不同的就业领域为大家介绍了近十年毕业生们的去向。她提到，文学院毕业生的就业领域基本分为媒体及出版单位、政府机构、国家企事业单位、民营企业、外资企业、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中学、国内读博、出国深造等十个方面。李博洋还通过详细的数据分析和图表解释让大家看到了十年来各领域就业情况的趋势走向，让大家对文学院毕业生的就业方向选择有了直观的了解。随后，袁雪飞则向分别向大家介绍了2014届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文艺学、语言学、古典文献学等九个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各专业由于研究方向的不同呈现出各自的择业特点。

我院成功举办

“京剧曲牌分类与功能初探”学术讲座

10月29日下午，受中国人民大学国剧研究中心的邀请，中国音乐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文字学研究会会员，国际命名学会常务理事，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师于昕博士，在人文楼二层会议室为人大师生成功进行了一场主题为《京剧曲牌分类与功能初探》的学术讲座。我院戏剧戏曲学教研室主任张一帆老师，国剧研究中心江棘老师，和对外汉语教学中心高永安老师；文学院戏剧戏曲学、古代文学、语言学等专业的部分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哲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以及北京大学、中国戏曲学院的有关同学参加了讲座。本次讲座由张一帆老师主持。

在讲座中，于昕老师着重介绍了几种“混牌子”的使用场合和音乐曲调。于老师认为，从曲牌在整个京剧音乐中的重要性来说，“混牌子”主要是解决了京剧在写实与写意转换中的一些技术问题，为剧情发展和演员表演营造氛围，塑造多元欣赏元素。

“清代戏曲与宫廷文化”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

11月3日，由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清代戏曲与宫廷文化”学术研讨会在逸夫国际会议中心成功举办。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杨慧林、文学院院长孙郁、国家清史办主任卜键、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商伟、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章宏伟，以及中国古代文学、语言学等专业的部分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参加了讲座。本次会议邀请海外学者8人，中国学者20人。国内知名学者与海外汉学专家荟萃一堂，谈笑风生，围绕清代宫廷戏曲，碰撞出激烈的思想火花。

上午9时许，会议在融洽的氛围中拉开序幕。由朱万曙教授主持开幕仪式，三家主办方分别致辞，对“清代戏曲与宫廷文化”学术研讨会给予极高期望。会议第一阶段，海外学者提交了专题报告。陆大伟、蔡九迪、矶部彰等汉学名宿语惊四座，凭借崭新的视

点和独到的领悟，展示了他山之石的不凡威力。会议的后半程，矶部彰教授进行发言。他以扎实的文献功夫，梳理了清宫大戏《升平宝筏》的诸版本系统。

下午的会议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国内著名研究者的汇报，后半部分则以青年学者的讨论为主。商伟教授关于万寿庆典大戏与大国心态的论述，鞭辟入里，发人深思。朱万曙教授则以总揽全局的眼光，考察清宫大戏的政治诉求和剧作者的文人心态。我院的郑志良老师、吴真老师也做了精彩发言。

我院学生会成功举办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与宗教”讲座

11月5日下午2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学生会特邀文学院海外名师、来自格拉斯哥大学的David Jasper教授做了题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与宗教”的学术讲座。讲座特邀外国语学院李华老师担任现场翻译。

David Jasper教授以幽默的方式开场，他说他来自“属于英国的苏格兰”，现场观众会心一笑，讲座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入了正题。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是对十八世纪理性主义的一种回应，在理性至上刚开始盛行的年代，诗人们以自己的方式提出情感的重要性，呼吁去大自然中感受和体验，学习自然所展示的理性无法解释的美和奥秘。教授在讲座中介绍了三位中国人熟悉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William Blake）、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和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并带领同学们细读了三位诗人的代表作，点出这些作品中的关键词汇及丰富含义，并指出三位诗人诗歌中对生命的本源和意义的宗教性追问。

2014我院研究生会第一次全体见面会举行

11月15日晚，文学院研究生会第一次全体见面会在公教3103举行。见面会由文学院研究生会文体部承办，文学院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李屹、罗观、余瑶，各部门的部长及干事参加了本次见面会。

例会首先由主席团李屹主席发言，李屹对于文学院研究生会的发展历史做了回顾，并对研究生会的各个部门的工作进行简要的概括，向研会新成员介绍了历年研究生会承办的各种活动。

游戏互动时间大家表现很活跃，通过猜词环节和歌曲竞猜的环节，在既放松又紧张的氛围中，部门与部门，部长和部员“打成一片”，两个环节之后，由主持人胜利的小组颁发精美的礼品。

最后，李屹部长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高度评价了各个部门部长和部员在开学之后这段时间内的工作。本次会议在李屹主席的总结发言中圆满结束。

本期
导读

专 2版·陆建德：反思传统文化 寻求“外围视角”
访 3版·王敦：治愈系良师益友
副 4 5版·文学与电影的《黄金时代》
刊

专 6版·聚焦文艺座谈会
题 7版·关于交换的那些事儿
8版·“双十一”购物·谁的狂欢？

反思传统文化， 寻求“外围视角”

——访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 陆建德教授

文 / 本报记者 袁满芳 刘启民
图 / 网络资源



“季节杂交”式的留学体验

9月2日下午3点，在社科院文学所的办公室中，陆建德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让记者印象深刻的是，初进办公室时，环顾四周，书架中、办公桌上、沙发上甚至是地上满目皆是书，其中不仅包括古今中外的小说、诗集、专著、文学史，还有最新一期的《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等文学刊物。简单的办公室中书盈四壁，让记者有幸见到了这位著名学者身后广阔的文学世界。

陆建德教授曾于1983年远赴英国剑桥大学，并在此完成了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学业，回国后长期致力于英文文学的研究。作为改革开放后较早出国深造的文学学者，陆建德教授和记者分享了一些留学剑桥的经历和收获。“最大的冲击可能还是，到了不同的一个学术背景和生活背景下，你会发现大家所用的语言其实是不一样的。这个语言并不是简单的从中文转换成英文，而是更大意义上的一种语言，是人们看一事情所带的眼光和范畴，

所用来说述的方法。留学时，中国人与欧洲人的这种语言的不同，给我印象非常深刻。”陆建德教授特别强调，视角的关注、话题的选择、角度的切入、事件的表述等这些“泛语言”形态，通过一个人在环境的转换中被感知和体验，而这背后，正隐藏着不同文化和文明间思维方式的不同。

这种语言的转换让陆建德教授获得了一种新眼光，对于他后来去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反思传统文化启发很大，“一个人需要离开自己的家乡，然后才会日益成熟，才能深刻地理解到自己的家乡，这就是一种外围视角。”不仅仅是在留学西方时能够获得这种外围视角，教授还对于来到我们中国文化中间的外国人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过去对于和玛露这样的传教士，中国人往往觉得他们来中国宣传基督教过于“用心险恶”。但如今重读传教士写的文本时，我们会发现他们恰恰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的外围视角，在中

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或“古已有之”的政体、风俗、人伦、道义等等，他们会给予一个西方传统和西方立场下的评价。“从后殖民批评的角度来理解，就是需要进行一种文化杂交，从一种文化进入到另一种文化，留学是一个杂交文化获得的过程，从其他文明的人眼中看我们自身，也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除了“语言的转换”，陆建德教授还在剑桥大学接受了扎实的学术训练，其中令其印象最深的即对于文本的细读程度。陆建德教授介绍道，西方的文学研究者非常非常重视文本阅读，他们往往对于文本分析的细致程度要求很高，研究者必须对文本背后的复杂旨意时刻保持高度的敏感性。而正是因为这样的学术训练，为陆建德教授的学术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教授在重读中国历史和文学作品时，能于细枝末节处屡获新解，能够不断开拓创新。

现当代文学的道德关怀

近年来，在持续研究英美文学的同时，陆建德教授也逐渐将研究的重心转到中国传统文学上来，并在与西方比较的方式之下，对我们的传统进行反思。他认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常常是自称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因此在文学作品中也充满了这类表述，其背后就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他们不爱社会，也不爱其他人，不会被其他事物感动，唯一让他感怀的是官场沉浮，做官的也并不是为了帮助他人，而是追逐功名成就。他们缺乏了一种崇高的爱。”陆建德教授批评道。在他看来，中国的作家过于将眼光局限于自身的得失，“他们思想中浸满了自己，因此中国文学中浸满了个人，对社会的共同体的认同度比较低。”因此，在传统文学作品中

同样缺乏了对于爱与温暖的传递：《三国演义》因在小集团的利益中纠缠因而崇尚计谋；《水浒传》里面的好汉大多血腥残暴；《红楼梦》有了一些温暖的人性底色，但它呈现的社会图景过于狭隘，以致不能感动到更多阶层的人。这些重要的文化历史小说的文本，都缺乏着普遍性的道德关怀和更具责任感的公共精神。此外，陆建德教授还指出，我们对于传统的文化的认识往往过于单一，这样从长远的角度看会遮蔽真实的历史。因此我们需要用多重的视角去观察我们的传统文化：专制制度中也会有合理的制衡机制，而我们一直标榜的优秀传统也会存在问题。具体以“孝”文化为例，教授谈到，中国古代社会都以家庭为单位，不提倡将人对家庭的爱拓展到他人家庭中去，因此

过于强调“孝”的话，就会对他人、他人的家庭产生排斥。陆教授说：“现在的媒体经常报道一些优秀事迹，尤其是揭示子女如何艰难地奉养父母，这也存在问题，因为此时‘社会’、‘国家’的概念就被完全遮蔽了。”

一个健全的国家应该为老弱病残提供生活保障，使得老有所养，如果将这个责任下放给个人，让家庭中的子女承担困难，然后将这种承担行为称之为“孝”，从更大的视野来看，这种“孝”文化则割裂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为国家和社会撇清了应负的责任。“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我们应该对于传统文化作出新的评价和取舍，但是前提是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它，才能作出有效的辨认。”陆建德教授如是说。

在采访过程中，陆建德教授始终强调：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是非观和善恶观。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非常简单的二元对立，即善与恶的二元对立。这种是非观在统治阶层与民间都有着很强大的生命力，人们习惯于用单独的一套语言体系看待世界，它具有高度战斗性，因此也具有巨大的伤害性。陆教授说：“我们要对极端暴力的、敌我分明的态度与说法保持警惕，这不利于文化生态的健康，甚至是政治生态的健康”。他还认为，中国

传统社会中的“复仇”文化也在社会中有很深的影响。人们一旦和他人结了仇，那么和他人相关的人都会成为我们的仇敌，在这种逻辑下，整个社会都有着很强的敌我意识和报复观念，“这样的社会缺乏协商能力和检查机制，无法达到真正的社会和谐。”而鲁迅的《故事新编》则是复仇文化的一个产物，作者正是从传统文化的复仇想象里获得了莫大的快感。“复仇”并未在西方文

化中产生较大的影响，他们并不能在复仇行为中收获美感，因而对于鲁迅小说的美学高度产生异议。严复曾说的“予人是我，我亦可杀”，实际上，就是对这样一种思想传统的一次反思，就是在倡导现代社会要审视自我、宽容他人。“而在西方，协商恰恰是有着很悠久的历史传统的。”陆建德教授提出，我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的确需要向西方学习他们的协商精神。

比较视野下的传统反思

在采访中，陆建德教授还谈到了他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看法。在陆建德教授看来，“现代性”一词所具有的阐释效力是有限的，它在具体的社会文化分析中往往就显得比较空洞，而可能是文化与文学血脉的传承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形成中发挥了更多的作用：中国的传统士文化一直停留在自我的漩涡之中而缺少了对群体的关怀，导致我们的古典文化的局面比较狭隘，这样的文化因子也同样被现代的文学所吸收。

“我们现代文学当中被当做两种不同风格代表的鲁迅与张爱玲，在外国人看来其实是有着同一种模式、同一种世界观的。他们笔下的人物同样阴暗、扭曲，他们所写的故事总体来说是缺乏暖色的。”对比现代文学，陆教授认为当代文学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大部分作家依然喜欢描写扭曲的

精神与世界，而缺少对“善”的文学表达，这已经成为中国文学面临的巨大瓶颈。教授用《茶花女》和《妻妾成群》来做对比，“林琴南翻译的《茶花女》在当时是感动过许多人的，因为茶花女背后是一个自我牺牲的故事，茶花女和阿尔芒恋爱，然而阿尔芒的父亲不同意，茶花女找了一个借口要和阿尔芒离开，然后她死了。可我们的故事不一样，比如说《妻妾成群》。故事里大家庭里的女人们都是牺牲者，然而这些牺牲者又在制造新的牺牲者，她们的手段和压迫者一模一样。”

陆建德教授补充到，我们的文学缺乏了道德关怀，并非没有“善”的精神资源：“我们的文明很早就有善的理念，比如儒家学说和墨家学说。但这些善的表述没有进入我们的内心，而仅仅只是被统治阶级征用为辅助统治的工具。因此

我们的小说家要把这些‘善’的道德力量重新释放，作家们反映社会的价值信念，同时也能改变社会的价值信念。”

采访接近尾声时，陆建德教授重申了“外围视角”的重要性。他认为，我们要打破对中国文学和传统文化的惯常思维，用一个陌生人的眼光重新审视它，有了这种反观能力、比较能力，我们才能够认清自身。在当下中国的汉学研究、在比较文学研究当中，这样一种“外围视角”也已经成为重要的学术实践。虽然说美国汉学家柯文曾提出，中国的事情要以中国为中心，但是陆建德教授强调：“对此，我们仍然需要反思。我们也要想象如果不是以中国为中心会有怎样的可能。有时候我们不能够太关注自身的形象，甚至要忘掉这个‘自己’，有了一个他的视角。”





王敦： 治愈系良师益友

文/本报记者 刘自新
图/受访者提供

王敦，北大中文系学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硕士、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教学领域包括文学理论、晚清小说、文化研究等。其数十篇中英文学术成果发表于《文艺研究》、《学术研究》、《文艺争鸣》、《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鲁迅研究月刊》、《中山大学学报》、《读书》、《现代中文学刊》、《中国图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报》、《光明日报》等。

为确保采访的顺利，在距离约定时间还有半小时时给王敦老师发了短信确认，结果却收到“木有问题”的回信，老师接地气的亲切表述，和他的形象很相符：“长相比实际年龄小、微胖，但音色雄浑优美”。这段王敦老师在其豆瓣主页上的自我描述也在记者见到其本人后得到了印证。在整个采访过程中，王敦老师一直面带微笑，在回答问题时时而托腮思考，时而耐心讲述，幽默风趣而又不失睿智。用他自己的书名《中文系是治愈系》来说，这位学士论文与硕士论文都做了儿童主题的“大孩子”，或许是一直“赖”在中文系里感受着阅读带来的治愈，也在教课的过程中治愈着更年轻的学生吧。

一、从中大到人大：穿梭于南北“宝刹”之间



“我觉得每一所大学都像是一座古代的佛寺，或者是中世纪的修道院，可以让很多像我这样喜欢思考的人，得其所”，当被问及在大学担任教职的感受时，王敦老师这样地表述道。2008年底至2013年底，王敦老师任中山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文艺学教研室主任。2013年9月起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敦老师把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比作南北两座名刹，他说，中大和人大都是很好的大学，容量很大，包纳了许多武艺高超的罗汉和道法高绝的僧人，他喜欢在这样环境中接受这些人的影响，享受在其中的阅读与研究。

王敦老师在本学期还担任了文学院2014级硕士2班的班主任，对此，老师坦言自己有一

个思想转变的过程。“我的脑子里有一个思维定式，觉得本科生才是最年轻、最有活力的。而且我在中山大学当过一次本科生班主任，四年下来看着一群青年成长，也跟他们一起成长。这种感觉我还意犹未尽，还想再经历一次。因此一开始我对于没带本科生还是挺遗憾的。”但是在与研究生相处了一段时间后，王敦老师发现，担任研究生班班主任更加有趣：“让我没想到的是，人大的研究生也同样年轻，他们和本科生的年轻不一样，他们处在人生当中另外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段。”老师把个体的成长分成两个重要阶段，一是在高中毕业后，确立“自己是谁”的阶段，它需要建立性格、性别、文化品位、三观、

处事原则等的自我认知，这是在本科阶段完成的事情。而到了研究生阶段，它则需要处理如何在社会安身立命、担任什么社会角色的问题。“后面这一个命题同样是一个巨大的有关成长的命题。从目前当班主任的体验来看，还是很惊心动魄的，让我看到了许多挣扎着、奋斗着的灵魂。我觉得，这是我莫大的收获。”对此，王敦老师总结到：人大绝大部分本科生在毕业时会选择适合自己的地方继续深造，而非直接就业，并且研究生数量也要比本科生多，因此个体成长的命题在研究生群体中显得更加重要。“用来吸取青春力量的重头可能不是本科生，而是研究生，这也是让我永葆青春的一个新方法”，老师笑着说。

二、从北大到伯克利：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王敦老师的一段颇为“离奇”的求学经历常为人津津乐道：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已经工作了五年半，却毅然选择回到学术领域内，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继续深造，拿了硕士与博士学位。面对这一段经历，老师在《中文系是治愈系》中自我解嘲式地称自己为“大器晚成”的文科nerd（呆子）。在我们的采访中，王敦老师向我们讲述了他对这次人生选择的真实看法。

“人们习惯性地按照出生年代的不同，把人群分成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并将不同的价值观也承载

于其中，”王敦老师说，“可在在我看来，人的出身环境、生活境遇可能比出生的时代给人更根本的影响。对于我来说，虽然我出生于70年代早期，但我的成长小环境，导致我的很多想法，可能要比全国各地的80后更90后一些，或者你可以说成是幼稚、自我。”王敦老师在九十年代末时已有较高的收入，但他仍然怀念读书的日子，于是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深造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当然这个事情你很难说是好还是坏，只能说凭着兴趣走到这儿了。当然真正凭自己兴趣走下去而没有崩溃更是需要毅力与勇气的。”说到这里，老师

又开始感性起来，“所以在《阿甘正传》里，阿甘妈妈跟他说，生活就是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生活是什么味道直到你把这盒巧克力吃光。我也是正在吃的过程当中，到底怎么盖棺定论，还不好说呢。”

回想起在伯克利的七年漫漫求学路，王敦老师有着自己的独特感受，也一直对自己的母校心存感激之情。“对于我来说，在国内本科毕业后工作了五年多，已经与学术完全脱节了，只能算作一个比较执着的、有本科学历的业余爱好者。因此我所有的硕博学术训练都是在伯克利完成的，我对于我得以吸收学术营养的那里，是感恩的。”

三、从东亚系到文艺学：打通学科壁垒



王敦老师从事了很长时间的听觉文化研究，这在国内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在本次采访中，老师也向我们介绍了他选择听觉文化研究的原因。“在我们这个‘无图无真相’的年代，声音问题似乎是被有意无意地遮蔽掉了。本雅明在谈及对艺术产品的机械复制时，不仅谈及了摄影术，同样也谈到了留声机的问题。因此声音也是在现代被机械复制了，现代声音是社会文化的造物，本同样超越了时空的限制。”王敦老师选择听觉文化研究，也就是想讨论一下被大家忽略掉但却非常重要的、作为现代文化不可替代的一个方面。王敦老师还提到了其导师对自己的影响，“他的一个研究侧面，就是从听觉文化研究的角度，其研究内容包括三十年代的爵士乐、上海的一些音乐现象以及留声机唱片等等，他甚至研究过台湾六七十年代的摇滚乐以及大陆的崔健”。另外，王敦老师还谈到了一个令人无奈的原因：由于国内学科界限分得比较明确，从美国东亚系毕业的他需要进入国内的学术体系内部，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研究内容，因此也就放弃了对博士时期的研究对象——晚清小说期刊的继续探索。“我要变成搞文艺学的，总是要找到和文艺学相关的东西吧，索性我就做听觉文化研究。虽然

在国外没有分这些二级学科，但文艺理论我好歹还是学了一些，但是如何转场成为文艺学，我也是绞尽脑汁了。”

自从2008年回国，到现在已经六年时间，王敦老师特别强调说，在中国的这六年里，他学到的要比在美国求学七年学到的更多。被问及能否具体谈一说在国内学到的知识时，王敦老师沉思了很长时间，向我们描述了他所面临的研究困境：“一是因为在国外的学习很有限，在硕士与博士的攻读过程中，的确能学到很多含金量很高的知识，但是如何拿这些理论知识在中国运用，则是另外一个大问题。二是国内的各个研究领域都有许多新的成果，这在国外是接触不到的。三是国内学术界有时会对国外的研究有一些曲解，这些曲解作为症候与焦虑点，也为我提供了一些‘药不对症’的线索。”

老师引用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来表述这种“药不对症”的研究现状——“肺病如能言，医者面如土”。“这是鲁迅30年代杂文里面的一句话，意思是说，医生不要以为自己掌握了一些方法，就能够在真正面对病人的时候，把病人的病情说得清楚。当肺和肺能够直接说话的时候，医生则会变得很被动，因为肺病能够说出来一些医生根本看不到的

东西。”王敦老师用这个形象的比喻来描述自己面临的学术困境。“回到国内的语境，有时候就会觉得，国外的汉学家就是医，而我们的声音就是肺病，我的意思是，肺病很重要，但是医者同样重要，因为你让肺病自己来治病它是做不到的，还得需要医者。同样，我们也是医者，国外也可以是肺病。不要有框框。懂得倾听和言说的不同模式是一种缘分。”

王敦老师还谈到了他自己的学术展望，他希望能将自己在国内吸取的营养和国外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将文化研究的视野拓展到更远的时段和更大的主题中去：“我希望把文化研究打通到一两百年幅度里去，因为现在的文化研究说的都是当下的事，而我心目中的文化研究是从中国十九世纪现代化转型开始的这样一个文化研究。比如说声音的现代化，或者都市文化里面的声音研究，就是要回到晚清，从晚清一直说下来，甚至要再打通到宋元，并借助声音将其变成一个沟通文学文本与历史文化的一条线索。我博士阶段的精力主要投入在晚清的小说社会和文坛上面，所以我也希望等到学科壁垒全冰消雪融的一天，凭借自己回国以后在学界重新学到的很多很多营养，然后融会贯通起来。”

四、从讲台到豆瓣：全心为学生服务



在学生心中，王敦老师拥有“讲台上的王老师”和“豆瓣上的王熊Daddy”的双重身份。王敦老师是豆瓣的资深用户，他在豆瓣上开设了多个专栏，分享自己的日常心得、为同学们解读书目、带着学生们一起写小说、创建豆瓣小组和同学们就课堂内容进行探讨、组织同城活动等等。在谈及为什么会在豆瓣上这么活跃时，王敦老师说，“今天的学生，就是明天文化的主体，我必须要知道目前正在发生什么”。

除了教师这个身份，王敦老师也是“学术和文学二重身 but one piece”的治愈系“文普”作家。受“科普”的启发，王敦老师认为“文普”——人文普及的工作——同样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文普”虽与学院派学术保持着一定距离，但并不是没有学问，而且还需

要做到通俗、有趣地传播学问，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学问的魅力——这的确像老师自己所说的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进行“文普”的工作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应该是老师的《中文系是治愈系》了。在这本书里，王敦老师记录了在中文系教书的亲身体验，入乎学术，出乎文艺，他尝试把学术和文艺相结合，让更多的人真正了解中文系的喜怒哀乐；这不是望文生义的“心灵鸡汤”，而是酸甜苦辣兼备的教育、学习、成长等问题的治愈案例。找到一种通俗的文体，和更多的人交流。正如《上海书评》对该书的一篇评论里说的，“如今满大街调戏教育体制或学科界限的人已经太多，而带着学生一步一步，身先士卒，左右突围的却太少，其最后者才算得上是文艺至

极，治愈至极，是一个中文系老师在当下的无用之用。”



扫描二维码
浏览王敦老师在豆瓣网上的个人主页

聚焦文艺座谈会

文/本报记者 李逸毛 琳
图/资源图片

从延安时期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央领导召开文艺座谈会是一种较为常态的惯例。改革开放之后，中央领导则多以出席文学艺术工作者全国代表大会、作家代表大会、文联代表大会并讲话的形式，参与文艺工作。但是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召开了改革开放以后的首个文艺座谈会，引发热议。这次的文艺座谈会并不一般。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最高领导人参加哪些会议、做多长时间的讲话都有一定规格。通常，党和国家领导人会出席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全国代表大会，并作重要讲话。一些重要的文艺演出也时常会看到他们的身影。但本次文艺工作座谈会既不是文联和作协的全国代表大会，也不是年度例行召开的文艺工作会，习大大的出席和长篇讲话堪称是高规格和超规格，对文艺界而言是罕见的。



走近文艺座谈会

Part 1 关于本次文艺座谈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14年10月15日上午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听取铁凝、尚长荣、阎肃、许江、赵汝蘅、叶辛、李雪健等7位文艺界人士发言后发表了长篇讲话。在大约2个小时的讲话中，习大大不但对当前文艺现状发表看法和评论，更深情回忆了自己少年和知青时期的文艺生活，谈到了文艺对自己成长的影响。

讲话中强调，文艺是一个时代前进的号角，也最能代表

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一个民族要经受苦难、铸造辉煌，文化的支撑力量不可或缺。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但无论如何艰难险阻，中国人都扛过来了，正是一代代中华儿女创造的中华文化为我们的民族提供了精神支撑。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文艺工作者是“灵魂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能

启迪思想，温润心灵。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应当从这样的高度认识当今世界上文艺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做好文艺界的工作，使之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支生力军是党和政府高度关注的课题。

Part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的十句妙语

1. 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
2.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3. 文艺是一个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4. 文艺不能再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再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5. 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

6.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

7. 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就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8.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

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

9. 要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政治上充分信任，创作上热情支持，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

10. 我国的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我”眼中的文艺座谈会

Voice 1 访陈奇佳老师

记者：作为军人的老艺术家阎肃说，军人心中的“风花雪月”是“铁马秋风”、“战地黄花”、“楼船夜雪”、“边关冷月”。习近平总书记表示赞同，并一再强调作品要有军味战味。您觉得这样的观点会不会使解放军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出现片面化的倾向？或者说，您觉得我们现在的解放军文艺作品，是如何体现这样的军味战味的？

陈奇佳：我觉得真正意义上的“风花雪月”和“军味战味”本身并不冲突。军味战味里面并不是不能表现战士的细腻的情感。你这个问题把“风花雪月”和“军味战味”对立是不对的。当然，我们从正面的角度说，习总书记的这个观点是很有道理的。举例来说，现在的一些战争电影、电视剧里除了各种各样的恋爱桥段，简直就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看了。有些战争作品把这样的恋爱关系，甚至是带有色情的多角关系，当做是解决矛盾的核心。把你死我活的民族战争讲得风花雪月。这个不但是对我们革命前辈的不尊重，对我们的敌人也是一种不尊重。

当然，军旅片从商业角度来说，带有一些风花雪月的故事，这个很正常。但是重点落在哪里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或者说一些好的作品应该有军味战味的追求，有一些历史的元素感。我个人觉得，现在军旅作品对于战争的残酷性，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战争对于人性的摧残的因素和人性

在战争面前爆发出来的光彩与智慧表现得还是很不足。特别是近几年在《亮剑》之后，亮点不多。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说“要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您对这个观点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认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者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陈奇佳：我主要还是谈谈现实主义吧。如果我们把现实主义的核心理解为对于生活的尊重和专注现实生活的话，那么我们现在的文艺作品无疑是有比较大的弱点的。我们现在的一些作家并没有深入生活，甚至简直没有生活。其实我们的生活是很有意思的：有那么多的行业、有我们的法律、我们的金融、我们的改革等等，虽然我们的体制还有一些不成熟的因素，限制了一些创作，但是我觉得更大的原因还是在于我们的作家不够深入生活。于是，常常有一些商业类的作家胡编乱造，一些自以为精英的作家也在胡编乱造。

所谓精神活动，你一定先要对精神活动的现实存在本身有一种考察，才能说出自己的个性。现在很多创作者生活都还没有生活过就来谈创作。所以坦率地说，有很多作品我们看了开头就能猜到结尾。

记者：这次文艺会谈提到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文艺与市场的关系，您认为文艺和市场的关系又当怎么处理？让观众

和读者用脚投票的方式为什么总会出现问题？

陈奇佳：什么叫出问题？出现什么问题？记者：就像《小时代》那样，尽管批评的声音很多，但票房仍旧很高。

陈奇佳：《小时代》票房很高吗？在这样巨大的宣传成本下，不拿这么高的票房才奇怪。我觉得“用脚投票”的好个案应当是《致青春》、《泰囧》、《失恋33天》这样的电影。《小时代》这样的电影炒得这么凶，背后肯定有商业的无形手在推动，这不是“用脚投票”的好例子。而且老实说，这样的商业操作往往是可耻和失败的。但是《泰囧》则是一个合适的例子，并没有太多的宣传成本，但却拿到了3亿多的票房，确实是一个传奇。所以，在中国，很多时候看起来是在用脚投票但实际上却并不是这样。事实上也是有商业的力量在操控。理由很简单，比方说《英雄》和当年的《无极》。票房都不算难看，但其实人们都知道它其实很难看，它花费的本钱太大了。因为我现在并没有很认真地做这个领域，所以只能大体谈谈。但是坦率说，事实上这个问题里还包含着官商勾结的问题。说实在的，像《黄金时代》这些电影，事实上是一些已经占有官方资源的片商，充分调动他在官方的人脉，所形成的一种貌似商业化的效果，我并不认为这些是“用脚投票”的概念。

Voice 2 学生

文艺座谈会消息一出，就引起了同学的热议。

13级本科生陈宇同学就表示自己“全程关注了这次座谈会”，他谈及对这次座谈会的直接感受，他说：“这次座谈会让人很容易联想到72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化用毛主席的一句话就是‘和泽春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此外，他对座谈会的一个细节记忆很深刻：“习大大让一些年纪大的文艺工作者站起来活动活动或者休息一下，这个细节让人感到温暖，是对文艺工作者的尊重，也使得这个座谈会更加像是一场座谈会而非会议。”13级本科生王伟同学则对习近平总书记谈及知青生活的这一细节更感兴趣，他说：“作为一个陕西人，听见习大大讲到自己的家乡，格外亲切。”此外，他针对座谈会上著名演员李雪健提出的“骂声与票房齐飞”的

文艺怪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骂声就代表了关注度，关注度提高了，票房怎么可能不高？我们国产电影总是噱头大于内容，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改变的，电影市场对社会效益和艺术的追求的力量是永远小于对经济利益的趋向的。”

针对这个问题，14级本科生王梦瑶说：“作为文艺创作的主体，文艺工作者必须要有责任心，不仅要对自己的作品负责，更要对观众负责、对人民负责，有自己的职业操守和原则。在创作的过程中，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要位置，而非过度追求个人得失，这样才能创造出高质量的作品。”

此外，还有不少同学注意到了习大大亲自给出的“书单”，其中包括《浮士德》、《老人与海》、《战争与和平》、《双城记》、《九三年》、《约翰·克里斯多夫》等

一系列名著。13级本科生郁坤铭同学对这些书单的第一印象是“高大上”，他说：“想不到习大大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文艺青年。作为一个政治家和领导人，习总书记的文人情怀让人倍感亲切。”他笑着说“天下文人是一家嘛！”此外，他表示这份书单还对他产生了激励的作用：“习大大年轻的时候看过的书有好多我还没有读过，在书单上挑些书好好看看呗。”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周小平和花千芳这两位网络作家也被邀请参加了此次会议。对此，2014级新生王刚在接受采访时说：“现在，网络作为一个越来越普及、流行的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他猜想：“习总书记正是想借此机会呼吁网络作家发挥积极的作用，承担起传播正能量的责任。”

与会作家、文艺理论评论界名单

- | | | |
|-----------------------------|--------------------------|----------------|
| 铁凝（中国作协主席） | 贾平凹（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陕西省作协主席） | 省作协主席） |
| 王蒙（中国作协全委会名誉副主席） | 冯骥才（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 梁晓声（当代作家） |
| 莫言（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协副主席） | 张抗抗（中国作协副主席） | 熊召政（湖北省文联主席） |
| 冯其庸（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 | 麦家（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浙江省作协主席） | 周小平（网络作家） |
| 王安忆（中国作协副主席） | 徐贵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 | 花千芳（网络作家） |
| 叶辛（中国作协副主席） | 阿来（中国主席团委员、四川作协主席） | 高洪波（中国作协副主席） |
| | | 玛拉沁夫（蒙古族著名老作家） |
| | | 王树增（报告文学作家） |
| | | 曹文轩（儿童文学作家） |

关于交换的那些事儿

文/本报记者 俞珂 郁坤铭
图/本报记者 李芙蓉

酸甜苦辣——那些台湾交换的日子

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学生对外交换留学越来越成为一股风潮。我们每年都会有许许多多的学生选择交换或是留学，他们或是去古老优雅的欧洲国家，或是选择繁华喧闹的美国，抑或是前往海峡的对岸。但是不管他们去哪里，他们都有着同样精彩的生活。今天，我们将通过对一些交换归来的同学的采访，深入了解那些留学交换生涯中所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

酸——
留学生涯背后不为人知的辛酸
交换留学，并不是一件随意的事，他不像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以率性而为。许多交换生在最初也是经过几番深思熟虑才决定下来的。同时，他们也许还会受到来自家长或其他方面的阻力。2012级本科生刘懿，上学期刚去了台湾交换一个学期，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在决定交换之前，她也曾担心学分问题，害怕因为交换而影响学分，耽误学习，同时，也有来自家长的反对，主要是母亲担心她会在台湾受骗，担心她的生活。除此之外，交换生们独自在异乡生活学习，也会在不为人知的地方默默流下辛酸的泪水。刘懿表示：“在外地还是会想家，但是因为从小在外地读书习惯

了，所以问题不大，但是会特别想念相处了两年的大陆同学和室友，尤其是在与新室友磨合的过程中，会特别想念以前的同学。”同样的，在交换的初期会特别想家和同学。

苦——
交换中的摸爬滚打
在许多学生的眼中，留学交换是一件十分“高大上”的事情，他们对留学的印象仅仅只是“有趣”。文学院2012级本科新生毛琳说：“我觉得交换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事情，尤其是去台湾交换，没有什么语言障碍，课程也比大陆少，所以交换生活应该十分轻松，毫无压力。”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2012级本科生刘懿表示并不是的，即使是在台湾，交换也不是特别轻松的。你要学会与新同学磨合交流，同时，台湾学生没有高考，他们的学习是很轻松的，但大陆学生还是要考虑学分的问题，所以也要经常学习到深夜。因此，留学交换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可以整天无所事事，逛遍名胜古迹，交换生们仍然需要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努力适应，努力学习，一个人摸爬滚打。

甜——
收获的甜蜜
在适应了交换的环境之

后，交换生们也交到了不少知心的朋友，拓展了朋友圈，收获到了不少的甜蜜。台湾交换生刘懿表示，“慢慢地，你会发现去台湾交朋友真的非常容易，因为他们很有耐心，很乐意与你交朋友，另外也有一些社团，比如信教的‘伙食团’组织，虽然有信仰上的差异，但他们真的会很热心地给予你无条件的帮助，不管是下雨时骑自行车送你去上课，还是请你去吃个饭，还是期末考试前给你送祝福和卡片，他们总是无条件对你好，他们的热情和真诚的特别暖心，非常让人感动。”

另外，刘懿还透露，她在台湾期间还加入了国标社，参加国标舞比赛，会经常和学长跳舞，经常一起吃夜宵，她也与国标社的小伙伴们发展了深厚的友谊，“我们会经常一起谈人生，谈理想”，刘懿表示，这些在台湾结交的友谊对她而言十分深刻，她会一直记住这些难能可贵的友情，“我们还约好明年一起再在大陆见面呢！”说到这里，她的语气难掩欣喜。同样的，现在是研二的台湾交换生李欣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她在台湾收获了许多段友谊，这种友谊是根本与政治无关的，“我们已经是相

当于剥离了两个人的地域和生活背景，纯粹的是一种情感上的友谊，它可以不考虑你来自哪里，不考虑你兴趣上或者说人生观上，某种观念上的差异，这种程度的友谊是和大陆同学的友谊完全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和台湾同学的这种友谊是完全可以建立起来并长久维持下去的，就像我现在有很多与台湾小伙伴的友谊还一直维持着，我们会经常一起互相探讨问题，友谊维持的比较长。”

不只是社交方面，在学习上，交换生们也收获良多。李欣觉得，台湾的教学方式单就研究生来说与大陆是十分不同的，大陆的研究生授课基本还是四五十人的大班教学，与本科生课堂一样，但在台湾，上课基本上都是三四个人一个课堂，多点的也就十几个人，她说，“上课的形式是大家讨论为主，要读的paper特别多，每个人在课上都要思考，上课发言的机会，频率也都特别大。还有就是大家可以随意在课上干什么都行，只要你在一直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所以台湾的教学，自主参与的成分会比较多，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同样的2012级的刘懿也深有同感，她说，台湾的学习氛围相当自由，但是在治学

方面十分严谨，她们用的教材都是全英文的，是世界上最风靡的那版教材，老师上课用的PPT也是英文的，讲课也会经常结合国际潮流，联系大陆实际，所以治学真的特别严谨，认真。

另外，她还补充道：“台湾老师比较注重对学生独立能力的考察，他们课程的考察方式特别复杂，需要交论文，交报告，还有几个小测，评分细则也比较严格。我们还有小组互评的方式，这主要也是为了考察个人能力，防止‘抱大腿’的情况出现”总之，她表示，在台湾真的学到了许多与大陆完全不同的东西。

辣——
那些轰轰烈烈的日子
当然，交换生们的生活也不只是围绕着学习，他们的课外活动同样的轰轰烈烈。刘懿说，她曾参加过佛院的一个叫“伙食团”的活动，一起去寺庙待了两天，去求“点心灯”，接受洗礼受教。她说，“在那两天里，我吃到了以前从未吃过的素菜，磕了几百个头。并且这项活动完全是那个社团自己出钱的，他们觉得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在帮助你戒清上辈子的罪恶，并借此传播他们的一些宗教思想。这项活动给我留下了非常

深刻的印象。”当被问到在交换期间有没有做过什么疯狂的事时，刘懿显得很激动。她说，最疯狂的一件事是在台中的最后一个晚上，她和台湾的学生们一起去“夜冲”，就是骑着机车晚上出去飙车，“我们骑着机车到了一个叫望高寮的小山坡上，吃着鸡爪冻，做完游戏后在马路狂奔。因为是最最后一天，所以我们一直玩到了凌晨两三点，然后又骑着机车狂飙回去。”在谈起这段回忆时，可以看出，刘懿十分怀念那段时光。

同样的问题，李欣觉得她做的最疯狂的一件事是当时认识了一个三十来岁的特别敢做敢闯的一个哥哥，于是在两个人并不是特别熟悉的情况下一起去了一次三天两夜的旅行。她说：“那次旅行其实是在彼此不是特别了解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俩当时约定就是相当于给彼此一次机会，信任一次陌生人，信任一次对方。那次旅行意义非凡，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HIA透露，她在台湾期间也参加了许多印象深刻的活动，比如和台湾大学生一起参与民间组织，了解他们怎样倡导一种自由和民主。公民如何主动参与社会政治中。总之，她们在台湾的交换生活都十分的精彩。



图为台北大学校长和文学院2012级本科生李芙蓉

申请台湾交换经验

文/孙义林（2011级本科）

学校教务处网站在3月以及9月会公布下一学期可以供学生选择的交换学校和交换名额。台湾的交换项目是一个学期。在截止日期前在数字人大系统内网上填写申请表，并交纸质版到学院教学秘书处。

申请表是在数字人大系统里自动生成的，内容包括你的基本信息（年级、学院、GPA、联系方式等）以及你的自我介绍。在数字人大系统里填写。填写完后从系统里直接打印，它会自动生成word格式文件。将纸质版交给学院教秘。有时可能需要同时提交学习计划书，学习计划书在教务处网站上自行下载填写。申请时可以填3个志愿，据说学校录取时会按照志愿优先。

台湾的项目是没有面试和英语成绩要求的，录取的原则据说是GPA高低（这个是确定的）以及年级（据说高年级优先，未确认）。在截止日期后3个工作日内，学校会公布录取结果。录取结果在数字人大

系统内公布，同时你也会收到短信提醒。

在录取完成后，国际交流处会召集所有交换生开会，这时会选定每个交换学校交换生的组长，负责联系学校和收集交换生材料。根据台湾学校的要求准备材料：通常包括中文成绩单，入台的申请表（2张，国际交流处召开的会上发）照片（尺寸各学校要求不同），有的学校要求体检按照学校规定时间交到国际交流处。这时候还要填学习计划书，因为台湾学校的课程此时没办法确定，因此可以按照往年开设课程填写，填写的课程不一定是最后修读的课。（其实这个没有什么意义，至少我最后实际修读的课和这时交的计划书完全不同）。

台湾的交换校会对你的材料进行审核，审核过程中有任何问题通常是由组长负责联系。台湾方面办好入台证后，会寄到国际交流处。组长会带领全组成员办大陆通行证。（在北

京办，此时通常会到7月）办大陆通行证需要户籍卡，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具体可以到出入境管理处网站上查询，组长也会在办理之前提醒，如果户口没有转到北京学校的集体户口的话还要有额外手续。

（具体我不大清楚，因为我是转到北京的集体户口）大陆通行证会在申请3周左右办好，到时候去出入境管理处取。如果离开北京可以在办理时申请快递寄回。带好台湾的入台证和大陆的大陆通行证证件方面就没问题了。

选课各个学校制度不同，时间不同，具体要求学校会发邮件到每位交换生的邮箱，交换生自己处理。

台湾的学校会发送邮件告知开学与学期结束的时间，根据这个时间自行购买机票。学分转换：所有课程都可以转校选（原典类和通识教育大讲堂类会有限制），与中文系课程沾边就可以转专业选修，课程名称相同才可以转专业必修。

链接

	派出时间	语言要求	派出对象	选拔要求
伦敦国王大学	1-6月	英语	本科生	成绩：GPA不低于3.3，有相关专业课程背景。 英语：IELTS不低于7.0（单项不低于6.5） TOEFL(iBT)不低于100（单项不低于22） 英语：TOEFL(iBT)不低于80；IELTS不低于6.0
哥本哈根大学	2-6月	英语	本科生（三年级）	英语：TOEFL(iBT)不低于80；IELTS不低于6.0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9-6月	英语	本科生	GPA: 3.6以上，且年级排名前20%。 TOEFL不低于95;IELTS不低于7 专业： 1. 如下专业同学需向国家留学基金委申请生活费及旅费资助。（经济学、国际政治、工商管理、金融学、劳动与社会保障、农林经济管理、新闻学、统计学、国民经济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 2. 各专业同学，按评审结果均有机会获得校长奖学金的全额或部分资助。

“双十一”购物·谁的狂欢?

文/本报记者 王昌昀 唐亦文
图/网络资源

“双十一”你购物了吗?从什么时候开始,购物成了一个全国人民共度的节日?无论你有没有主动参与到这股消费的浪潮里,它早已裹挟着整个社会,甚至当你在对它说不的时候,就恰恰证明了这点。我们不是这群狂欢的人,就是这场狂欢的旁观者。

一、“双十一”：从光棍节到购物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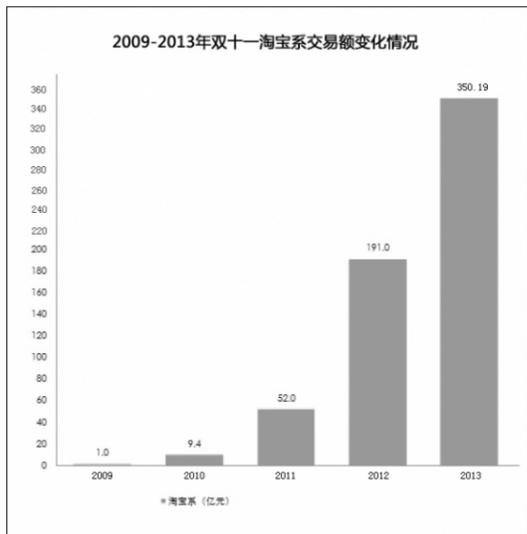
1993年,南京大学“名草无主”寝室四个大四学生每晚举行“卧谈”,一段时间卧谈的主题都是讨论如何摆脱光棍状态,卧谈中创想出了以即将到来的11月11日作为“光棍节”来组织活动,从此,光棍节逐渐发展成为南京高校以至各地大学里的一种校园趣味文化。随着一批批学子告别校园,这个节日被渐渐带入社会,并随着成年单身男女群体的庞大,以及群体活动和网络媒体的传播,光棍节在社会流行开来。

11月11日,一直是光棍的节日,直到……

2009年,天猫开始在11月11日“光棍节”举办促销活动,最早的出发点只是想做一个属于淘宝商城的节日,让大家能够记住淘宝商城。选择11月11日,也是一个有点冒险的举动,因为光棍节刚好处于传

统零售业十一黄金周和圣诞节促销季中间。但这时候天气变化正是人们添置冬装的时候,当时想试一试,看网上的促销活动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对消费者有吸引力的窗口。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双十一”成为电商消费节的代名词,甚至对非网购人群、线下商城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力。

2009年,天猫商城双十一销售额为0.5亿元;2010年,9.36亿元;2011年,天猫双十一的销售额已跃升到33.6亿元;2012年,“双十一”当日支付宝交易额实现飞速增长,达到191亿元,其中包括天猫商城132亿元,淘宝59亿元;2013年,总交易额350.19亿;2014年,阿里巴巴中国零售平台的交易总额为571亿元人民币。在这段不凡的路程上,行走着的是中国一波正在兴起的消费阶层。



2009-2013年双十一淘宝系交易额变化情况图

二、买买买：加入消费大军

当零点的钟声响起,阿里巴巴会议报告厅里大屏幕上的数字停止跳动的时候,你是否意识到自己也为这571亿元贡献了一份力?11月11日,再也不只是一个数字特殊的日子,也不再只是一个“光棍节”那么简单。当它年复一年裹挟着“网络狂欢节”袭来的时候,它早已成为一个全民网购的饕餮盛宴,人大学子自然不可能置身度外。

就在这场“战役”开始之前,空气里就似乎已经弥漫着不寻常的气氛,里巷弄堂、街里街坊开始充满了一股硝烟的味道。这一批狂热的消费者就像是一支整装待发的大军,似乎要攻破前方耸立着的“堡垒”,而这“军队”中,不乏千千万万的学生一族。文学院2014级本科生何金芷说:“虽然在‘双十一’开始前并没有特别激动,但是当天还是在网络上逛到凌晨三点。”在真正开始这场“战役”后,像这样熬夜抢货的人并不在少

数,文学院2014级本科生邱会洪和文学院2014级本科生王振威也表示,“双十一”当天晚上自己也坚持到12点钟声响起的时候才开始齐刷刷地购买商品,可谓狂欢到了午夜。据这几位同学称,担心想要的货物被抢光是熬夜抢购的重要原因。“我原本打算‘双十一’买的的东西一下被抢光了,我刷到凌晨两点才刷到一个比较满意的。”文学院2013级本科生王伟如是说。对此,王振威笑称:“事先我把要买的商品放到购物车,这样就不用担心啦。”可见,在双十一购物上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对1530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24.4%的受访者直言自己属于网上冲动消费的“剁手族”。这种所谓的“剁手族”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双十一’那天晚上我一时冲动就买了小米平板。”一位同学在接受采访时说,“原本之前考虑了很久的买iPad

Air)还是iPad Mini,结果双十一晚上冲动就买了小米平板,这还是当晚才做的决定。”此类的冲动消费也发生在何金芷的身上,她说:“有些吃的我不是很喜欢但是看起来在做很划算的活动就买了。平时我不怎么在网上买零食,但是这次看到促销就买了好多。”不过,还有不少同学也并非全盘盲目消费。“我刚开始准备买一个特惠保温杯,所以跟两家店的客服聊了好久,最后还是觉得价钱和平时没便宜多少就没有买。”何金芷说道。

除此之外,何金芷也表示“双十一”购物也会有物流速度变慢的顾虑。在节后接收快递的过程中,由于商家不同,快递到达的时间也是前后不一,经常出现刚领完一个又

三、局外人：不买的N种理由

任何一条奔涌的浪潮都有侧涌之流,任何一个狂热的行为身旁也必定站着一群置身度外的人,当掀起喧嚣的帷幕时,站在场外的观众同样不乏其人,“双十一”也不例外。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对1530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于“双十一”34.9%的受访者态度一般,6.3%的受访者不期待,另有2.5%的受访者对“双十一网购节”有些反感。而站在这狂热的购物圈外的人,他们又是持何态度?他们不买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在被问及为什么看到那么多便宜的商品而不买时,文学院2014级本科生张国文表示:“便宜的东西多了去了,你看,门口卖袜子的也便宜,是吧?”对于网友极力的追捧现象,张国文也有他的观点:“买东西也不是看便宜与否,至少要和自己的需求相对应吧,买一堆不需要的东西不是浪费吗?这方面我还是比较清醒的,没有盲目从众。”即使平时也有网购的经历,但是在面对诱人的商品前,也并非所有网友都是那么热衷。

调查显示,对于“双十一”54.2%受访者最担心虚假宣传、价格虚标。“虽然不了解内情,但是肯定有部分商品是先提价再降价吧。”张国文也同样有这方面的顾虑。从往年的“双十一”经验看来,确实有许多虚假宣传现象的发生,即便商务部不久前发布消息表示“双十一”不实宣传的情况有明显改观,可是,心存顾虑的网友也并没有直接扔出钱包任由各种鱼龙混杂的商家瓜分。

除此之外,快递爆仓、收货延迟、网站系统瘫痪、担心预售商品不能七天无条件退换……与消费狂热伴生的这

得去领的情况。王振威对此感同身受,他甚至吐槽道:“为什么不能统一一下,一起通知领取呢?”各种“节后综合征”不一而足,而销售如此狂热,快递繁忙也在情理之中,甚至爆仓频繁,个中不便之处也是在所难免,消费者在购物之余也应当心存宽谅之心。

当硝烟散去,理性回归,大多受访者或多或少坦言自己存在一定程度的冲动消费,也有同学直呼“冲动是魔鬼,下单须谨慎”。而看到国人在仅仅38分钟28秒中就创造了100亿的消费额的时候,我们知道,电商的新神话已经诞生了,而这个数字的背后站着的,恰恰是成千上百的消费大军。

么多的问题使部分人在“双十一”这块诱人的蛋糕上退步再三。对于快递收发情况,人大校园100店长林丽倒是有不同的观点:“双十一期间我们校园100开了动员大会,并且增加了人手和工作时长,专门配备后勤人员和补给,所以一切显得非常有有条不紊,快递收发状况有很大的改善。”

不过,真正令人担忧的恰恰并非上述情况。“双十一”过后,除了抢物美价廉商品的喜悦外,还要留意随之而来的各种陷阱。这一点恰恰可能是最致命的。例如有以下这样的新闻出现。“双十一”期间,消费者李女士网购了一双鞋。第二天她上网时,看到页面窗口下弹出一个对话框,“卖家”说,她买的那双鞋没货了,要为其退款,并发送一个退货网址。李女士打开网址后,显示让其输入银行卡号、手机号等内容。她立刻与店家联系,得知她所购买的商品已发货,没退货通知。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不法分子利用网店的名义以“无货”、“交易异常”、“异常订单处理”等为理由,提出为消费者退货退款,并发送过来退货链接网址,消费者打开网址后输入相关信息就会被骗。消费者接到这类电话时,不要轻易相信,要与卖家确认,不要轻易打开重新发的网址链接,并警惕个人信息泄露。

总而言之,在“双十一”网购的热度之下,希望各位消费者能理性对待“双十一”网络狂欢购物节,提防恶意的网络诈骗行为。在采访过程中,当记者问道为什么不参加网购时,文学院2014级本科生陶天衢玩笑道:“没钱!”也许这个玩笑之言恰恰是最能令人会心一笑的吧。

评论

消费的崛起与我们

“双十一”逐年扩大的规模,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消费人群的扩张,一种消费习惯的形成,一个消费产业的运作。消费行为在崛起。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型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中国社会很快进入到商品丰富的时代,居民消费力也随之以惊人的速度得到发展。消费的增长带来的是更深层次的变化,人们获得了新的传播方式,新的社会话语词汇和新的闲暇方式,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场消费的革命。“双十

一”正是这场革命的大游行,超2亿人的规模宣示着消费的地位:“我消费,我自豪”。这种消费的自豪感正是基于一种物化的价值观,而这也是从贫困中走来的我们身上不可否认的烙印。但这也只是社会转型的一个瞬间而已,每一段历史都会留下它的印记,消费社会带给我们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也就让它们与时代共进吧。我们,巨大社会里渺小的我们,则可以坚持着自己的价值,就是在历史的大潮里也可以打出自己的小漩涡。

链接

Part 1 网购男女性别比



统计显示,在数以亿计准备投身网购热潮的网友中,女性占71%

Part 2 网购方式



2014年11月12日凌晨,阿里巴巴公布了“双十一”全天的交易数据:支付宝全天成交金额为571亿元,移动占比42.6%

Part 3 双十一销售额

